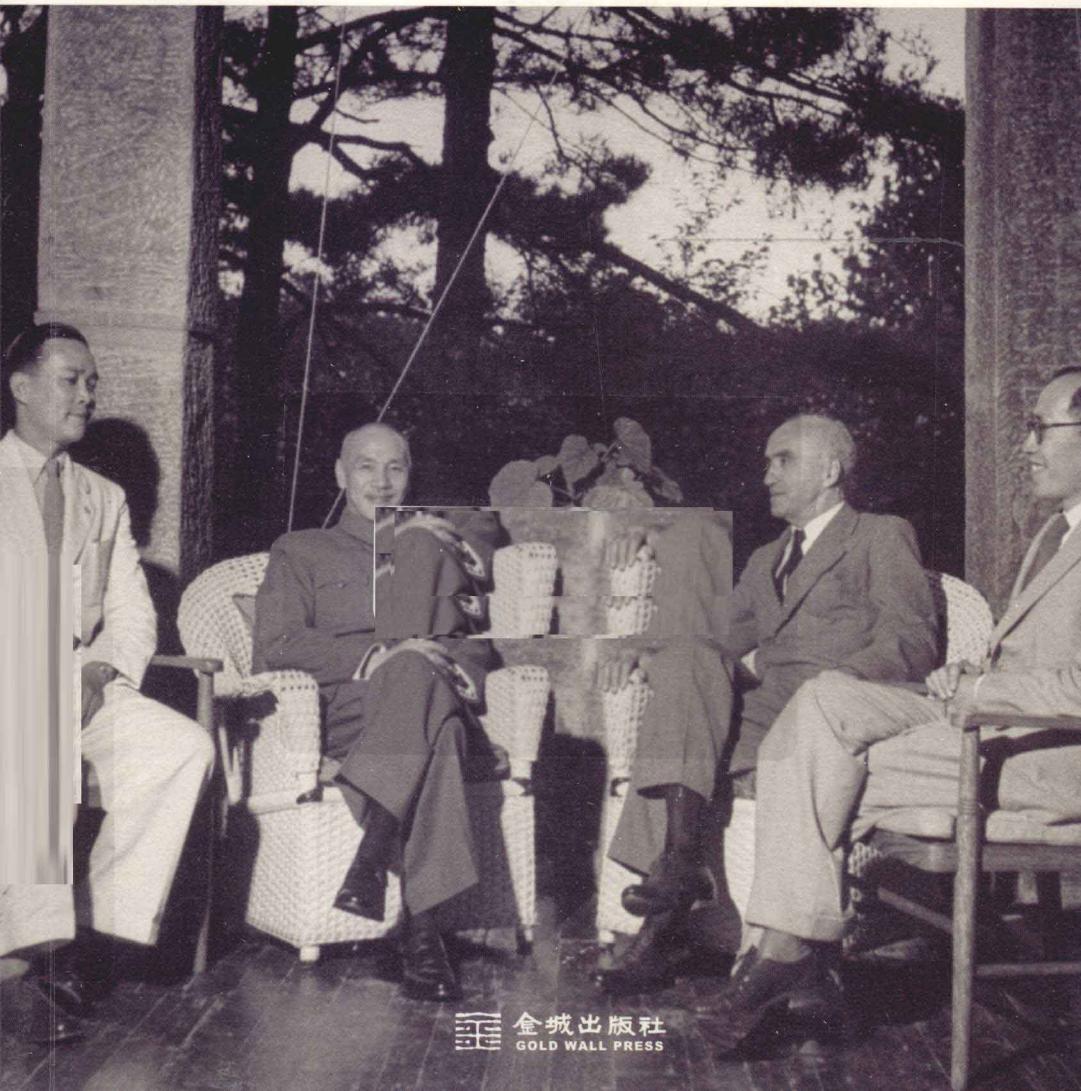


解封民国

Unfold The Republic of China

民国记忆从密闭的档案室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，这种记忆由断裂到复苏，由扭曲到复原，
由禁忌到开放……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

解封民国

Unfold The Republic of China

民国记忆从密闭的档案室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，这种记忆由断裂到复苏，由扭曲到复原，
由禁忌到开放……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解封民国/唐建光主编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1. 5

ISBN 978-7-80251-913-8

I. ①解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中国历史—研究—民国 IV. ①K258. 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60789号

Copyright©2011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**金城出版社**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。

解封民国

作 者 唐建光

责任编辑 雷燕青

开 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

印 张 12

字 数 150千字

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913-8

定 价 28.0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序：一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

1912年1月1日，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首期临时总统，誓曰：“颠覆满洲专制政府，巩固中华民国，图谋民生幸福。”

这誓言，距今已然百年。也正是由此，民国开启了它命运多舛的历程。

总统的誓言，不应当仅仅看做是一种个人承诺，更应该是看做他所代表的国家政权对国民的承诺。

由孙文开端，历任民国总统无不给国民许下了庄严的承诺。袁世凯在誓言中，要“发扬共和之精神，涤荡专制之瑕秽”；黎元洪在誓言中，要“嗣后一切设施，自应谨遵法律办理”；冯国璋在誓言中，要“府院一体，内外同心……但求利国，不计其他”；徐世昌在誓言中，要“适用民生主义，悉力扩张实业”；曹锟在誓言中，要“以法治为根基，以守法为要义”；蒋介石在誓言中，要“向真正的民主而学习”，而李宗仁，这位生不逢时的“代总统”也同样做出了“进行民主改革，获得民众支持”的承诺。

强国、和平、统一、共和、民主、法治……这些至今仍熠熠生辉的名词，装饰着总统们华丽的誓词，也装饰着民国与国民的梦境。

然而，誓言历历在耳，承诺却屡屡成空。“无量头颅无量血，可怜购得假共和！”——这是时人对时局的悲讽之议。屡屡成为空头支票的誓言，最后变成民国动荡的政治现实。

“我不否认我们中国是忧患重重，我更不否认我们建国前途，是十分艰巨，民主的基础条件，还是薄弱。但是时代的力量，已使我们向民主宪政前途里程碑迈进了一大步，尽管横在面前的还有汹涌的波涛，而我们必须迈步前进，则是任何困难所不能阻挠的。”

这是1948年5月20日，蒋介石就任总统时的誓词。而此时，他应该已经知道，这个时代已在弃他而去。那些华丽的誓言，在现实中已成镜花水月，它们的主人，在历史中也只是过往一客，但这个国家，仍将继续向前行进。

目录 Contents

乌托邦时代 001

1912年冬天，在《论人心之枯窘》一文，著名记者黄远生以惨淡语气，回顾了辛亥前后人心的变迁、信念的破碎：“晚清时代，国之现象，亦惫甚矣。然人心勃勃，犹有莫大之希望。……（今日）全国之人，丧心失图，皇皇然不知所归，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。”

1918年，一种精神古老、话语崭新、无比清新的时代变奏，席卷了中国，席卷了被称为“第三代人”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。

福建：陈炯明打造“安那琪世界” 文/丁三	005
湖南：枪杆子下出宪法 文/杜兴	017
山东：新儒家的乡村“复辟” 文/李远江	028
广西：“新斯巴达”的强兵之路 文/白伟志	039
江西：蒋经国“赤化新赣南” 文/孙展	051

1937耽误中国多少事 065

至1937年，中国棉稻麦也基本实现了自给，经济学家何廉说：“农业经济发展已步入‘起飞’之路。”

到1938年底，中国将拥有60个具有现代作战能力的陆军师。

而紧随而来的卢沟桥枪响，使日本也陷入了长期苦战的泥沼，也使中国耽误了和平建国的机会。

常常有这样的假设：如果再给中国五年时间，又会怎样？

宋子文：党国金融家 文/老舒	069
王宠惠：苦撑危局 文/杜兴	077
胡适：三个愿望 文/徐路加.....	087
《大公报》：泪与血中的奋进 文/丁三	099
解封民国.....	107

随着一个个民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的去世，带走了诸多一言难尽的恩怨，也打开了民国大门的一丝缝隙，那些被封存的日记，被上锁的档案，被禁声的人物，渐次开了口。

“民国热”开始从草根走向庙堂，从虚浮走向沉稳，不仅仅意味着民国记忆从密闭的档案室走到大众的视野当中，也意味着这种记忆由断裂到复苏，由扭曲到复原，由禁忌到开放的一种可能。

孙中山：理想主义者的治国困局 文/杨东晓	111
蒋介石：一生未完的民主课 文/凡歌	121
民国：一段尘封历史的多重脸谱 文/王刚	130
《民国史》：一部史书的50年曲折 文/王刚	140
杨天石：民国史研究者的怕与不怕 文/李杨	152
民国史的底稿：四亿字的来龙去脉 文/福琪	161
抢救“民国史”：唐德刚的一人敌一国 文/傅国涌	169
“民国热”：民间推手掀起的“骇浪” 文/丁三	172

乌托邦时代

文/丁三

1912年冬天，在《论人心之枯窘》一文，著名记者黄远生以惨淡语气，回顾了辛亥前后人心的变迁、信念的破碎：“晚清时代，国之现象，亦惫甚矣。然人心勃勃，犹有莫大之希望。……（今日）全国之人，丧心失图，皇皇然不知所归，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。”

1918年，一种精神古老、话语崭新、无比清新的时代变奏，席卷了中国，席卷了被称为“第三代人”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。

1912年冬天，在《论人心之枯窘》一文，著名记者黄远生以惨淡语气，回顾了辛亥前后人心的变迁、信念的破碎：“晚清时代，国之现象，亦惫甚矣。然人心勃勃，犹有莫大之希望。……（今日）全国之人，丧心失图，皇皇然不知所归，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潢断流之中。粮糈俱绝，风雨四至，惟日待大命之至……”

这个观感，说尽了千万士绅、知识者的走投无路，中国社会的凄楚与绝望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一种异常灰暗、无比压抑的时代气息，悄悄地蔓延开来：一方面，范爱农、魏连殳、吕纬甫……这些或真实、或虚构的落拓人物，成为几年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；另一方面，洪宪称帝、张勋复辟、派系林立、军阀混战……一场场闹剧走马灯般地上演着。在政局的日显荒诞、人心的愈加灰凉中，蔡元培、汪精卫、李石曾等同盟会元老，先后发出了“不做官”“不当议员”的誓言；而鲁迅更在日复一日的灰色市井中，看到了一个无望的人间。

这是最坏的时代。过往浩浩，而前路渺渺，旧的家国与天下已被彻底粉碎，残留的精神与伦理资源也日渐边缘化。这又是一个孕育着微茫希望、新的生机乃至前所未有的世界谱系的时代，在几年的号哭绝望、奔走呼喊之后，一个个知识者、一群群青年乃至为数众多的当权者，纷纷将目光投向英美的角落、日德的深处、法俄的新思潮乃至旧传统的源头，试图找到新世界的人口。从1917年开始，以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雄健追问为先声，种种新观念、新术语、新的社会实验和道路鼓吹层出不穷，成为盛极一时、蔚为壮观的时代景象。

1918年，一种精神古老、话语崭新、无比清新的时代变奏，席卷了

中国，席卷了被称为“第三代人”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。这种被命名为“安那琪”的社会主张，以“三无”“二各”为理想形态，即无政府、无宗教、无家庭，“各尽所能”“各取所需”；它视合作、“互助”为人际纽带、理论基础。一时之间，千万人为之倾倒：守旧士大夫从中看到了《礼记》、孔孟理想的痕迹；青年知识分子则以社会进化论为出发，不仅看到了一种“甘美、博爱、互助、自由”的新生活，而且看到了文明输出欧美、中国引领世界的广阔前景。在这样的追求和向往中，富有理想色彩的陈炯明将军也被裹挟其中，他试图以“闽南护法区”为依托，渐渐通往一个安那琪的国度，一种天下大同的未来……

如果说，撇除出身、职业、社会地位，安那琪信仰者大多是精英分子、理想主义者的话，那么，从1920年开始，以湖南为中心、蔓延几省的新宪政运动，则以中下层士绅、知识分子为骨干。在两任督军赵恒惕、谭延闿的支持下，三千万湖南绅民决心以地方宪政为起点、以联省自治为中介，通过渐进方式，自下而上、由地方而中央地实现一个美式合众国。

也是1920年，在“全国掀动”的安那琪工读互助实验失败后，一大群原先的实验发起者、曾明确表示信仰安那琪的青年才俊，急剧地向左转了。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张国焘、邓中夏、恽代英、施存统……纷纷成为布尔什维克信仰者。在参与国共合作、实践“新三民主义”后，他们走向民间的步伐，由城市而乡村，由工人、市民而汪洋大海般的赤贫农夫。与此同时，在救亡风潮和军阀混战的背景中，另一种动员社会、集结民间的社会模式，也先后进入了众多军阀和当权者的视野。他们或以之为工具，或视之为理想，有的借鉴，有的狂热追随。

在救亡图存、一盘散沙的民国图景中，军国主义以及法西斯运动，追求的是一种“成本最小而效果最著”的社会模式。它以“急”、激进为色彩。与此同时，一些传统主义者乃至西式知识分子，则以“渐”、改良为手段，开始了富有成效的“乡村建设运动”。如果说晏阳初、陶行知等西式知识分子以杜威实用主义为宗旨，那么，包括梁漱溟、卢作孚在内，他们的种种努力则意味着新儒家主义的诞生、向传统源头探求民族新生命途径的实践。直到1937年，伴随着卢沟桥的枪声，“乡村建设运动”连同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民国社会实验，一同步入尾声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这里不仅有救亡图存的工具性探索，更有追寻新社会模式、建构新天下形态的终极性色彩。正如礼崩乐坏之后，先秦圣贤以百家争鸣的方式探求天下新路径那样，在又一个“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到来之际，民国志士们以种种“主义”，来探求这个国家新的转机、新的生存形态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中国向何处去”的追寻并未结束。

福建：陈炯明打造“安那琪世界”

文/丁三

在这样的苦苦探求后，一条漫长而充满艰辛的道路渐渐浮现出来：陈炯明试图以“自治”“联省”“联邦”为三大步骤，以“建国”“建亚”“建世”为三大目标，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，安那琪世界。

1920年8月31日，在发往华盛顿的一份报告里，美国驻厦门领事凯利顿（A. S. Carleton）以复杂的心情，高度夸赞陈炯明在漳州两年的政绩：“陈氏……施行各种市政改革，他用的手段，近乎革命；但成效极佳，结果人民都感满意。这令中国人看到，事可办成，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……”（美国外交部文件，4091号）

在凯利顿看来，陈炯明统治下的闽南二十六县，堪称“模范小中国”；而不久前访问漳州的美国驻华使馆武官艾利森也注意到，“漳州到处可见到建设的显象……道路拓宽，新屋不少，街道清洁，治安良好。美国侨民对陈之施政，也均引以为荣”。他特别强调了几大市政工程：公园、公共菜市场、屠宰场、河堤、漳厦公路……那么，在谈及陈炯明及其“闽南护法区”时，凯利顿、艾利森们为什么显得忧心忡忡呢？

凯利顿谈到，在漳州的众多美国人，都认为陈炯明是一个“社会



陈炯明(1878—1933),1911年流亡香港

期间,结识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。刘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。

主义者”,尽管“不属于最激烈派”,英国驻厦门领事杜尔士也发现,这一年的4月7日,在有四千余人参加的学界春季运动会上,陈炯明散发了“大量有着布尔什维克色彩的宣传单册”。而在陈炯明的办公室里,英美烟草公司的一名经理注意到,他收藏了大批安那琪主义书籍及宣传资料……

又何止是视“社会主义”为洪水猛兽的西方人?这一年,在游历漳州之后,一小群北大学生以无比激动的语气,宣称他们看到了一个“闽南的俄罗斯”,他们认为,陈炯明的新政手笔,“共产时代亦当不过如此”。而持“左倾”观点的一份德国报纸,更夸张地赞叹说,“东方一颗明星,正在发出光芒”……

那么,陈炯明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?他治理闽南护法区的理念,是不是来自俄国呢?

“罪恶的包袱”

谈及漳州新政,不能不谈到陈炯明的密友、安那琪运动先驱刘师复。

1911年5月，在流亡香港期间，陈炯明结识了这个比自己年幼六岁、毕生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青年。在此后的几次长谈中，刘师复为他展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世界图景。

所谓“安那琪”，是“无政府主义”的音译。它以“三无”“二各”为特征，即无政府、无宗教、无家庭，“各尽所能”“各取所需”。在财产公有的前提下，这个社会老有所养、幼有所依，人际间以互助与合作为纽带，没有战争、掠夺、压迫和剥削，四海恍若一家。它是类似《礼记·大同书》的美好人间……

这么一个天地，让陈炯明向往不已。它契合了他的久远心事、社会理想。

远在广东法政学堂期间，陈炯明就倡办海丰地方自治会，他设立戒烟局、整理育婴堂及义仓，并创办《海丰自治报》，这些努力与安那琪理想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。他的儿子陈定炎后来回忆说，海丰地方每有盗劫案发生，“（该报）常以‘不均产之害’为标题”，对于财产公有，他自有探究兴趣。自从1909年夏天被推选为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，他发起“禁绝赌博案”“停止就地正法案”“裁撤警保总局案”“设立游民教养院案”……所有这些，不仅是他后来的漳州新政、广东新政的伏笔，而且勾勒出一个典型的地方士绅形象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，安那琪不过是绅权社会的一个巨大变种……

如果说，此前陈炯明的民粹倾向，他对社会问题的关注，他的“均产”追求，他对地方自治的孜孜探索，都不过是零散的、自发的，那么，安那琪却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观念载体，一种寥廓恢宏的世界景象。结合舶来已久、盛极一时的社会进化论，它不仅是可能的，也似乎是“科学”的、必将抵达的。

问题在于，该如何通往那个至善至美的世界呢？安那琪的入口在哪里呢？

刘师复没有答案。在宣扬主义之外，他“不做官”“不当议员”“不做军警”；他“不吸烟”“不饮酒”“不赌博”“不坐人力车舆”“不用仆

役”“不茹荤”……他甚至拒绝婚姻，以此实践“无家庭”的追求。他试图以一己心力，影响并改造社会。而对此，陈炯明表示：“罪恶的包袱，丢掉困难，肯背起它更难；师复教人丢，让我背上一辈子吧！”后来，他的密友、刘师复的另一追随者梁冰弦谈到：“这话的意思就是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’。”（梁冰弦《解放别录》）

他果真背上那个“罪恶的包袱”了。当年冬天，率领三千余名暴动者光复惠州的陈炯明，出任广东省副都督；而在胡汉民追随孙中山北上后，他更代理广东都督职务。此后四个多月，他改良风俗、整饬吏治、清查市井、推行新政；时任广东教育司司长的钟荣光后来谈到：“前清官绅兵役之威、省城嫖吹赌盗之害，一扫而空”；而同期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报告，无疑更加客观：“尽管有了大变动，但广州实算平静。陈将军的措施很激进……他下令将娼寮关闭，将江中‘蛋民’（船户）全赶走，严行禁赌禁烟。他的本国支持者说，陈炯明将在全省推动新政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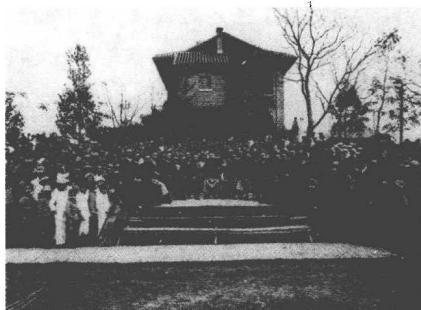
但，这仍然不是安那琪的人口。直到几年以后，他才以“联省自治”“联邦自治”为纽带，衔接地方自治的起点及安那琪世界的目标。

“安那琪”的入口

陈炯明的“联省自治”构想，大约形成于流亡南洋时期。

1913年7月18日，在近四个月的犹豫徘徊后，陈炯明终于介入了孙中山的“二次革命”。这一天，他召集一群心腹军官，宣布“广东独立”；但军官们态度之激烈，让他大吃一惊：钟鼎基、张我权出走香港；饶景华公开表示反对；苏慎初、谭鎔钦也态度消极……随着一伙骨干的离去，万余名粤军顷刻瓦解。与此同时，在广东省议会厅，当陈炯明要求议员们签字时，“有二十余人趁势逃席”；次日，被迫签字的议员们也纷纷发表声明，宣称“急盼中央派兵痛剿”……

一夜之间，在广东有着极高声望的陈炯明，沦为孤家寡人了。8月4



1921年4月5日，陈炯明参加广东岭南大学植树节仪式并作演讲。1920年至1922年陈炯明主粤期间，大力发展广东教育事业。

日，他抵达香港，随即前往新加坡。在无比苦涩的心情中，他“每日只粮食三餐，或香蕉数只”，“卧则行军床一具，床上臭虫如黑蚁”。他似乎有意以苦行僧的方式，逼迫自己思考广东的未来、中国的出路。

他渐渐地理解了他的同仁。他们不愿参与“二次革命”，并非出于一己之私。不久前他意欲让位给胡汉民，全城军官、士绅、商人极力挽留，这底下是思定的人心，“地方自治”、不涉内战的汹涌暗流。这就是他与千万广东男女的无言约定：一旦他将战火引向广东，无论友人、故旧还是父老乡亲，都会立即抛弃他。他们不愿再卷入无尽的政潮、连天的战火和没完没了的是非了。

正因此，当孙中山邀他前往日本时，他说：“昔日可战之卒且复累万，可据之地何止一省，犹且不肯负固以困民生。今无尺土一兵，安敢妄言激进？”

他艰难地劝告着孙中山：“夫兵凶战危，古有明训。苟可以免，畴曰不宜？”并表示，他“畏惧革命之心，乃国人之所共谅”。

这是他第一次拒绝孙中山的召唤。自从1912年4月24日他们结识以来，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他；而他们见面的当天，孙中山就要求他交出广东都督的职务。

他的思考由此更加深沉。从海丰自治、广东独立到遥远而璀璨的安那琪梦想。他决心以和平、渐进的方式，为广东父老、为亿兆苍生找一条新路子。史料记载，在两年多的时间里，他“每日不分昼夜办公读

书，寝无定时，且为时极短”（《哭亡友陈君竞存》）。而在这样的苦苦探求之后，一条漫长而充满叵测的道路，渐渐地浮现出来了：他试图以“自治”“联省”“联邦”为三大步骤，以“建国”“建亚”“建世”为三大目标，构筑自己的安那琪人生，安那琪世界。

也就是说，地方的自治，并非基于军队、官吏，而基于民间、社会；省际的联合，并非基于武力的征服，而基于自觉地合作。几省如此，几国如此，天下世界亦如此。毋庸讳言，这一切只能寄望于思想的传播、人心的交融。这是一条前无古人的路。

他似乎没有觉察这当中的深刻悖论：以执政者的身份，追逐安那琪的梦想。无论如何，能奠基一省的地方自治，即可造福一方。至于能走多远，那是谁也无法预料的。

1916年1月6日，在两年多的蛰伏后，陈炯明潜回广东，参与了讨袁战争。他召集了十路旧部，在反袁檄文中，他第一次提出“联邦”主张：“……事定之日，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，公选元首，代表国家……”

又两年，经过无所事事的赋闲，陈炯明率领万余粤军，攻占了闽南二十六县。他将这片小小的土地命名为“闽南护法区”；而在他的心中，这是一块试验田，试验安那琪理想的、并不那么让人满意的田土。他茲茲不忘的，还是广州的街巷。

“闽星，闽星”

几十年后，受邀访问漳州的安那琪信仰者梁冰弦还记得初晤陈炯明的情形。他说，一踏上漳州的土地，“便留得异样的印象”，行馆在新落成的公园边上，刚把行李放进房间，陈炯明就来了。梁冰弦谈到，“陈氏身穿灰布袍子，手持一根藤手杖，翘起两撇威廉须”，因为患有远视眼，他“乜斜双眼”。

陈炯明随和而健谈，“一谈便过了两小时”。梁冰弦写道：“然后由